

兴县文史资料

(第九辑)

孙良臣纪念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兴县文史资料 (第九辑)

孙良臣纪念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兴县文史资料》第九辑（孙良臣纪念专辑）

编 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 刷：汾阳市东日喷绘印刷公司制

印制时间：二〇一〇年四月印刷

开 本：16 K

字 数：12 万

印 数：1—1300 册

山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2009）第 286 号

工 本 费：36 元

前 言

“晋绥革命根据地”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东至同蒲铁路，与晋察冀、晋察鲁豫革命根据地毗邻；南达山西最南端的黄河风陵渡；北迄祖国北疆绥远省（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的百灵庙、乌兰花一带，衔大青山及内蒙古草原。抗日战争时期，它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也是延安通往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咽喉要道。解放战争时期又是陕甘宁边区的秘密大后方。在 1939 年至 1949 年历时近 12 年的艰苦岁月里，晋绥儿女节衣缩食，出钱出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其中民主人士的鼎力相助功不可没。民主人士、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先生源于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以及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敬佩之情，忠心耿耿和共产党合作共事，为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民主法治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幸的是，1947 年晋绥土地改革，由于边区主要领导极“左”思想的膨胀，错误地将他交由群众批斗至死，成为边区土改中唯一一位被害的在职的高级领导干部。出版此纪念专集一为缅怀孙良臣先生，又值 2011 年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纪念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

编 者

2009 年 12 月

目 录

前言

孙良臣传略.....	1
------------	---

平反昭雪 铭旌忠良

1、《关于孙良臣同志四七年土改中被错杀的结论意见》 中共 吕梁地委组织部（报告）吕组报字〔1989〕7号.....	26
2、《关于孙良臣同志被错杀结论的批复》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 部（批复）晋组复字〔1990〕16号.....	28
3、孙良臣同志墓地碑文（山西省兴县人民政府）.....	29
——原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书记 赵 林.....	30
5、荣辱与共 肝胆相照 ——原吕梁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薛延忠.....	33
6、题词 原中共吕梁地委书记张陆绪题词.....	35
原中共兴县县委书记刘光彦题词.....	36
原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进德题词.....	37
原陕西省粮食厅厅长杨再清题词.....	38
原西北纺织工程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秦天泽题词.....	39

回忆与思念

孙良臣被害的前前后后·····	
·····赵怀成 康联宜口述 王金平整理	40
渡过寒冬便是春·····	孙启民 46
安息吧，蒙冤的父亲！·····	孙启民 54
牛荫冠谈孙良臣·····	牛荫冠 56
父亲的教诲永不忘·····	孙启晏 58
斯人远去 风范长存·····	康明玉 王振东 74
怀念孙良臣先生·····	屈 健 77
随孙良臣院长前线劳军记·····	杨文廉 82
缅怀一代乡贤孙良臣先生·····	方 彦 87
缅怀孙良臣先生·····	牛联棣 92
纪念孙良臣先生·····	康少钧 93
忆孙良臣先生·····	牛旭光 94
学习父亲孙良臣的革命精神·····	孙启元 96
怀念岳父孙良臣院长·····	胡 健 101

孙良臣生前部分作品

参观延安之后·····	102
庆祝晋西北行政公署三周年纪念·····	104
我们怎样来拥军·····	105

对参加旧金山国际大会的意见..... 107

要认真行使我们的民权..... 109

制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 111

慰劳归来..... 113

悼黑岔山遇难烈士..... 118

制止反动派扩大内战..... 119

中共“七七”宣言是中国人民爱国意志的集中表现..... 121

慰问小记..... 122

孙良臣在高等法院
与行署其他领导联签的部分文件

关于开展民间调解工作的指示信..... 124

关于各区县保送司法干部到行署受训令..... 126

关于健全司法机构清理积案的指示信..... 127

关于优抗工作的指示信..... 129

关于整理卷宗笔录记载的指示..... 131

关于加强监所人犯生产教育的指示信..... 132

关于偏关县高柳女、王元东一案的通知..... 134

关于各县判处一年以上的人犯按规定分别送监执行并覆核
覆判的令..... 135

关于贯彻保障人权令各县切实执行的令..... 137

关于今后解送人犯注意事项的令.....	140
关于临县高桐昌图奸未遂逼死人命的通令.....	142
关于离石县冯守义、樊铁孩、于润则因奸杀人未遂一案的 通令.....	144
关于今后各县发生命案必须专报的通令.....	146
关于法院日常工作的通令.....	147

附 录

《南游记》	孙嘉淦 149
《三习一弊疏》	孙嘉淦 172

后 记.....编者

《兴县文史资料》第八辑勘误表

孙良臣传略

王金平

孙良臣(1884. 12. 19-1948. 1. 1)，原名孙梦棣，曾用名良成、良诚，山西省兴县固贤村人。祖上孙鸿淦、孙嘉淦、孙扬淦弟兄三人曾分别考取清朝康熙、雍正年间进士。孙良臣是孙嘉淦嫡亲后代。父亲孙仰卓，出身农民。母亲郭氏，家庭妇女。孙仰卓夫妇都不识字，继承祖先遗产窑洞七孔，土地百十垧。土地大部分出租，少部分自种，农闲时兼营煤炭买卖和饲养家畜等为生，有时也放账，家境曾一度较殷实。二人共生三男一女，孙良臣是长子，老二孙梦傅，老三孙梦岩。女儿孙兰英早年生一男孩后去世。

孙良臣少年时家境并不富裕，较大年龄才到甄家庄高进茂老先生的私塾读书。每天他很早起床，先干完家务活才去上学。母亲疼爱他，常给他带两个自家种的烤熟了的小西葫芦充饥解渴，为此，受到一些同学的戏弄取笑。有时，有些调皮的同学故意碰撞，西葫芦水流湿了孙良臣的衣襟，但他并不在意。每日只是认真读书、刻苦自励。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钻研，进步很快，深得高进茂老先生的赏识。高先生曾带他和几个学得好的同学去外地考试，孙良臣考取了清末附生。当时正值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妄图瓜分中国，晚清政府贪腐无能，丧权辱国，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人心思变。

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倡新学、力求改革。在高老师的教导和鼓励下，孙良臣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心愿，千方百计地说服家人，力争到太原学习新学。

辛亥革命时期，孙良臣正在太原法政学堂学习，他和牛友兰、牛映台、贾克明、温琪铭、邢肇迁等兴县籍爱国学生追求民主进步，一起参加了太原学生推翻清政府巡抚陆钟琦的斗争。他们是兴县第一批剪了辫子的人。民国初年，孙良臣等先后都回到兴县从事新文化教育工作，是当时竭力提倡学习新文化、新风尚，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一代青年。孙良臣曾费大力气劝说父母和家人同意他的妹妹孙兰英和女儿孙启枫不缠足，送到城里上女子学堂（后为女高）读书，这在当时兴县南川一带尚很少见，开了当地一代风气之先河。

1918年，孙良臣参加兴县教员资格考试，获得教员许可状，为继续从事新文化教育的推广工作创造了条件。他主张“教子成人”。他二弟孙梦傅从小就不劳动，也不爱读书，好吃懒做，以至染上了赌嫖歪风。老人去世弟兄们分家后，所得的一份财物和土地，也很快吃光用尽。不能自力更生，只好随老婆流窜外乡，病困去世。三弟孙梦岩，小学文化，也能劳动，帮父母饲养家畜、料理家务很好，可惜“晋西事变”时独子随赵承绶部南退，意外而死，其妻李氏悲痛至极身亡。孙梦岩思想狭隘，精神颓废，被一孬女人纠缠，到处流窜，一齐潦倒。这两件事对孙良臣的刺激很大，教育很深。他认为：“养不教父母过”，父母不能只顾孩子的吃、穿、玩，从小就应培养孩子爱劳动、爱学习、爱家庭、爱集体、爱国家的理念；有勤俭朴实，自尊自强奋发向上的毅力，至少应有自食其力的信心和本领，逐步体会“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劳动光荣，不劳而食当寄生虫、蛀虫最可耻。世间坏人多数是从懒馋开始的，懒、馋、贪、占，再到嫖赌烟（色），进而盗窃、抢劫、铤而走险，不可救药。他经常告诫周围的青少年及自己的孩子，

“三人行必有我师”，人各有长，不论人对己有失误，要主动总结经验教训，而且要分清“公过”与“私过”，“公过”尚可恕，“私过”不能饶。他不愧是孙家这一辈份中继承祖传书香门弟的优秀后裔之一。

1920年，孙良臣考入山西省政府所办区长训练班，1921年赴平遥任二区区长，一千五年。他为人正直不阿，清廉自持。他给家里写信时说：“我孙氏屡世居官，代代清苦，今此小小区长，万不敢贪利害民，以污祖宗父母令德！”他在平遥任区长调离时，别人认为他当了几年区长，一定有不少积蓄，建议给他雇辆大车送行，但他只有随身穿戴的几件衣服和书籍，行李简单。所以只雇了一头毛驴就搬迁了。

1926年他在太谷县任区长，一度兼任县佐。一年后又调阳曲县任区长，任职三个月。之后，回到兴县当绅士。节假日可以回家的机会多了，他得空就教孩子们唱“打倒列强，除军伐……”等歌曲。过春节写对联，挑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北伐成功，南望中山”、“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等。并深入浅出地给大家解释其含意。他说：“这不是孙中山的发明，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传颂不断的人类文明进步的哲理。只要排除一切自私自利，有可能逐步走向天下太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老有所养，幼有所学的美好社会”。

1929年，孙良臣受聘兴县防疫局局长。刚刚上任，兴县南川出现大规模鼠疫。他不顾个人安危，辛勤奔波，请回汾阳教会医院的医生一同驻扎在疫区，劝导群众打预防针、灭鼠，并进行环境消毒，尽最大努力治疗早中期患者……，直至疫情扑灭，受到群众的好评。

1930年，他受阎锡山政府委任赴方山县峪口镇当区长。在峪口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留下了清正廉洁的好口碑。群众说他是好人，生活俭朴办事公正，没有官架子。有一次，区里把一个地痞恶棍抓起来严加处罚，有人向他求情，并送来了礼物。他对来者申明理由：“为

官要为民，决不能贪赃枉法，包庇坏人！此人作恶多端，残害乡里，鱼肉百姓，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求情送礼的人只好把礼物带走。1931年春，他被土匪绑走，群众自动地集资1000元由商会出面将他赎出。当他回到镇上时，老百姓男女老少，挤到街上夹道欢迎，孙良臣频频拱手致谢。许多老年人还热泪盈眶地说：“平安回来就好！”

1931年夏，孙良臣因病回兴县休养。

“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忧国忧民，经常看着报纸给周围的孩子讲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暴行，并深有感慨地说：“中国缺少现代科学技术，又不团结，一盘散沙，所以帝国主义敢横行霸道”。一再告诫孩子们：要勤奋读书、学文化、学科学，锻炼身体，不当“东亚病夫”，将来好保卫祖国，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我们要有志气，决不能当亡国奴，要知道“亡国之奴，不如丧家之狗啊！”这些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地刻印在每个孩子的头脑里。

1932年，孙良臣前往太原育才馆受训，1933年到山阴县任区长，在任五个月。此间，日本人占领全部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后又向长城推进。政局动荡，内忧外患，孙良臣适逢身体不适，又遇母亲病危，遂辞职回到家乡。埋葬母亲后，在兴县官盐店工作，继在牛友兰办的兴县初级中学任庶务（总务），一年后，受县长委任到财政局当局长。

1935年10月，阎锡山为防止陕北红军东进，成立了河防司令部，在沿黄河东岸驻军，修筑了无数碉堡、炮楼。并在沿河各县成立了“防共保卫团”，阎授意他们抓捕共产党人后，可先斩后奏，规定抓住一名共产党员，赏银元一百块。兴县县长李凯鹏兼兴县防共保卫团政治部主任，公开扬言“兴县有两万共产党，非查不可”。并把捕杀的共产党员人头挂在县城城门上，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孙良臣听说后，气愤地和亲友们说：“兴县只有七、八万人口，除老人、小孩，家庭

妇女，还有多少人？随意镇压老百姓和进步人士，只有日本人高兴，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倒行逆施！”

1937年春，由兴县县政府邀聘，孙良臣担任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致力于开发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工作。“七·七”事变后，兴县留省学生王立波、王直、康明玉、张立、牛联棣、康锐、康振仪、裴亚东等先后返兴县作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孙良臣对他们宣传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很欣赏，渐渐认识到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才能赶走日本人。于是他对共产党由观望、同情到拥护，并积极参加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带头执行减租减息，带头缴纳公粮，交好粮。带头发动家属多做军鞋，交好鞋，为支援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

11月，时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兴县动委会经济部部长的著名士绅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并任经理。目的是为兴县老百姓服务，为抗日救亡筹措资金。在刘少白的鼓动下，孙良臣和本县士绅牛友兰、刘砚畲、杨邦瀚等积极响应，并带头入股，成为兴县农民银行董事会成员。在他们的带动下，兴县有100余户富户相继参股，从而在较短的时间筹得股金三万余元，保证了兴县农民银行的开业启动。此外，孙良臣还将自家早先赎回的族产“三进士”大院无偿提供银行做办公场所。

年底，牛友兰受县长张干丞委托在其商号“复庆永”基础上筹办兴县产销合作社，经营生活用品及生产毛巾、被子、军用裹腿等支前物资。孙良臣受邀担任协理，协助杨怀仁先生筹办纺织厂，为解决军需民用之急，四处奔波，不遗余力。

1938年以后，日军在继续沿同蒲铁路线向晋南入侵的同时，也逐步深入到晋西北和吕梁山腹地，对兴县形成了严重威胁。兴县城和沿黄河渡口经常遭到日军空袭，有时一天之内拉好几次防空警报。同时

兴县也有被日军进占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经孙良臣提议将生产部（纺织厂）下半年迁到离固贤村不远，远离主要公路和大集镇、且四面环山十分隐蔽的孔家沟村。在生产稳定之后，孙良臣又回县城主抓营业部的工作。

1939年底，因阎锡山授意薄一波主办的新军，其数量超过了阎锡山原有的晋绥军，且逐渐公开倾向于共产党，对其的管理和控制，阎锡山感觉力不从心，于是发生了妄图消灭新军的“晋西事变”。事变的结果，中共中央和阎锡山达成了以汾离公路为界划疆而治的协议。晋西北赶走了阎锡山设在兴县的山西省第二游击行署主任赵承绶，结束了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共存的局面。1940年2月2日建立了实际上由共产党主政的“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1941年8月1日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改称晋西北行政公署）。阎锡山被迫任命晋西北军民大会公推的续范亭、牛荫冠为主任、副主任。孙良臣被兴县县长张干丞任命为第四科（建设科）科长，积极从事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孙良臣在任上，大力组织地方力量，开荒地、整河滩，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他还想方设法鼓励兴县老百姓多种棉花、多织布支援前线。还和妇救会共同组织纺织工作团赴二区小善村一带配合行署村选、冬学等工作发动与组织妇女参加纺织生产。

孙良臣不但自己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斗争，还教育动员家属参加抗日工作。大儿子孙启民16岁考入兴县中学，20岁考入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毕业后分配到徐沟县公安局担任见习警官。抗战爆发后，回乡参加了兴县牺盟游击队。晋西北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后，被分配到兴县民族革命学校担任总队长。1941年初孙良臣被聘为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建设处副处长后，他举贤不避亲，又举荐他的儿子孙启民继任兴县抗日民主政府建设科科长。大女儿孙启枫参加牺盟会所办军政训练班学习后参加了妇救会的工作，被选为妇救会组织

委员。在“反扫荡”斗争中，她舍生忘死带领群众安全转移，是一名优秀的抗战妇女干部。二儿子孙启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即留二分校工作。三儿子孙启晏高中阶段后在西北工学院纺织系学习，孙良臣早有意让他弃学回兴县参加抗日根据地工作，由于边区行署领导劝阻，孙启晏继续留校学习。小女儿孙启元和大儿媳马玉娥，孙良臣也动员她们到兴县产销合作社纺织厂当了工人，为抗日出力。就连孙子孙一匡也参加了游击队，在雁北一带活动，后担任右玉县区长。这样，一家中有八个人服务于当时的抗战。在1941年4月2日的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上曾刊登文章介绍和表扬。

1942年4月，兴县士绅牛友兰先生发起倡议组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事业，以吸取经验，作为发展晋西北生产的借鉴。孙良臣和兴县的刘少白、白玉成（白玉璋）、贾克明（贾文德）、任辑武以及其他县的共十五位绅士积极响应，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中共晋西区党委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并视为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士绅参观团当年5月4日出发，从兴县黑峪口乘船顺流而下，到陕西佳县改陆路骑马经绥德，于5月21日抵达延安。参观团在延安先后参观了机关、工厂、医院、学校等共38个单位，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各厅厅长为参观团接风洗尘。在延安开会的贺龙师长和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晋绥分局书记林枫也设宴招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以及朱德、王若飞、杨尚昆等领导专门设宴并与参观团成员进行了座谈。在延安的亲眼所见让孙良臣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使他对陕甘宁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十分钦慕。尤其令他佩服的是那些在边区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人士，他们的生活都异常艰苦，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粗布衣，但他们充满着为国为民的激昂热忱，充满着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埋头苦干，昼夜不息；政权结构“三三制”的实施及整风学习的热烈，

使他深感在延安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也使他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信心。决心今后紧跟共产党毛主席，为抗日救亡、建设富强文明的新中国而奋斗终身。可以说，延安之行是孙良臣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参观团离开延安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专门社论“送别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让他们告诉河东人民，日寇败象已成，败期已定，但困难会愈益增加，要团结。尤其对几位六十多岁高龄而不辞跋涉之苦的士绅们感奋万端，倍加赞扬。

参观团返回兴县后，兴县县政府8月19日专门为兴县士绅牛友兰、孙良臣、白玉成，贾文德四先生举行欢迎座谈会，并在第一完全小学校（简称完小）举行欢迎大会，参加者1000余人。诸绅士均登台致词，对边区的参议会、农民生活、工厂、学校、医院等建设，一一进行介绍。孙良臣在发言中特别对于共产党之真诚与党外人士合作，以及诸革命领袖的艰苦奋斗作风，表示敬佩。对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侵略者，表示坚信不移。并提出晋西北目前应加紧生产建设，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来渡过艰苦的两年的中肯建议。

8月22日，孙良臣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又在《抗战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参观延安之后”的感想，盛赞边区各项建设事业。他在文中说：“过去对共产党，对边区了解的太少，对共产党施行的政策，或一知半解，或报以拭目以待的态度，此次参观以后，充满了无限新的良好印象，更加深了对于共产党的深刻了解”。特别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等人崇拜的五体投地。

1942年春季起，在全区村选民主运动的基础上，各地各界普遍开始进行参议员的选举。9月18日-21日，兴县选举出席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正式参议员，到会公民代表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了贺龙、孙良臣、刘象庚（刘少白）为正式参议员，刘献君、白怀璋二人为候

补参议员，报载孙良臣因较高的声誉得票数仅次于贺龙。

10月24日——11月11日，孙良臣出席了因安全原因在黄河西岸陕西神木呼家庄召开的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会上续范亭当选连任为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武新宇当选为副主任。贺龙、杜新源、张文昂、孙良臣等十九人被选为晋西北行政公署行政委员。《抗战日报》11月14日载文称：孙良臣善于理财，且热心教育，追求新学，对抗战胜利具有坚决信心。他呼吁晋西北各阶层亲密团结，巩固抗日的统一战线，产生三三制（中共党员、中间人士、进步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有力政权，加强对敌斗争，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建设繁荣富庶的晋西北。

11月15日，晋西北行政委员会决议孙良臣为行署民政教育处副处长，杜心源为处长。他在莅临民教处全体干部欢迎大会上，以恳挚谦虚的态度表示愿以年老力衰之身与全处同志互相砥励，共同完成任务。并称行署是真正实行了“三三制”的政府，今后大家当一本至诚，溶成一体，共同为晋西北人民负责。继而又对政权干部及广大青年吃苦耐劳，忠于人民的精神，备加称许。他说：“自己虽已年老，但看见有无数青年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就觉得中国前途有无限远大，现代青年都勇敢有为，虽多是不识字之青年庄稼人，亦属后生可畏。曾见本乡民兵虽一字不识，但国家民族观念极深，每到夜晚，即三五成群，往敌占区破坏敌人交通，彻夜奔波，兴致勃勃，令人赞叹不已”。

1943年1月15日，在行政公署庆祝成立三周年之际，他心潮澎湃，亦在《抗战日报》撰文纪念。他说：“在我们来纪念行署三周年的时候，目前的任务就是加强反蚕食斗争，把敌人挤出去！这里主要的应是加强训练民兵，提高民兵的斗争技能，教育群众，提高人民的信心，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打击敌人，达到封锁敌人，室毙敌人的目的”。“为配合各抗日根据地及各友区的军民加强反攻准备，